

大学人文

第8辑

王康

我的精神麦加

尤西林 贺靓

对社会保持理性的距离

——尤西林教授访谈录

崔卫平

解读昆德拉

罗银胜

听吴敬琏先生谈顾准

张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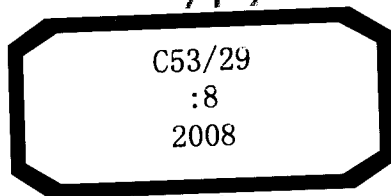
深圳：城市精神与人文阅读

夏中义

谢泳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大學人文

清園主元化



第 8 輯

DAXUE RENWEN

夏中义 谢泳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人文. 第8辑 / 夏中义, 谢泳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5

ISBN 978-7-5633-7491-5

I. 大… II. ①夏…②谢… III. 人文科学—高等学校—
课外读物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434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西清路 9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0.75 字数: 205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2 **王 康** · 我的精神麦加
 ——在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的演讲
- 8 **尤西林**
 贺 靛 · 对社会保持理性的距离
 ——尤西林教授访谈录
- 16 **崔卫平** · 解读昆德拉

[知识生活]

- 26 **罗银胜** · 听吴敬琏先生谈顾准
- 32 **张 克** · 深圳：城市精神与人文阅读

[沉 钟]

- 46 **邵 建** · 胡适北美日记检读(五题)
- 61 **李新宇** · 转向的原因
 ——《叩问陈独秀》之六

- 75 **李 钧** · 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作为文学家的储安平

[观 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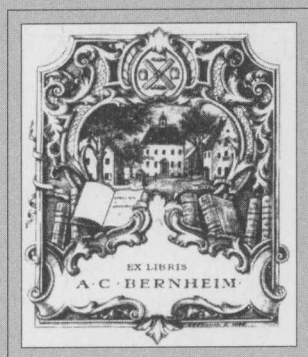
- 84 **夏中义** · 做时代期待你做的
 贺 靛 ——夏中义教授访谈录
- 91 **杨冰郁** · 西北工大“大学人文”书简
- 94 **侯洪颖** ·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2007 年度试卷暨答题撷英
- 107 **李 立** · 汕头大学“大学人文”2007 年度试卷暨答题撷英

[新青年]

- 124 **崔 帅** · 替人思过：另一种受难
- 127 **李青桃** · 有关“弱者”的一公升思索
- 130 **耿 唯** · 剑客
- 132 **陈 芸** · 一个俊 fan 的心声

[我的大学]

- 140 **周 宁** · 平凡的生活，活得像个英雄
 ——在厦门大学 2006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 142 **杨玉圣** · 作为精神家园的燕园
- 147 **聂 尔** · 晋东南师专往事
- 155 **肖有志** · 读书的心情
 ——大学断记
- 166 编后语暨稿约



[独立评论]

DULI PINGLUN

我的精神麦加

——在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的演讲

■ 王 康

上帝就像俄罗斯一样忧郁，
上帝也一直注视着俄罗斯。

——普希金

2

大学人文「第8辑」

章诒和从俄国回来，在电话中盛赞俄罗斯，用异常华美、诗意盎然的词语形容那里的原野、河流、教堂、涅瓦大街、冬宫、皇村……还特地借台湾名嘴陈文茜之口说，跑遍世界，最神往难忘者，唯俄罗斯，那个辽远寒冷、刚获自由、眼神迷离的国度。诒和近乎唠叨地叮嘱：康兄，你可得去一趟！

不知去过多少次了，早已是那儿的常客，在莫斯科大学恢弘的廊柱下，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宅第的角落，在通往弗拉基米尔大道的驿站口，在茨维塔耶娃走向上帝的那个小镇，在只有俄国才有的那些秘密、私下和公开的精神集市中……这些俄国人的眼光多么奇妙！充满忧伤但绝不暗淡，耽于深思又如冰凝雪积。他们似乎看到了世界的尽头，却一代接一代搀扶着走进骷髅地，穿越无边无际的苦难“瀚海”。我多么熟悉他们的表情、手势、用语：莱蒙托夫、帕斯捷尔纳克们额角的转折面，直接闪烁着从古希腊神庙放射出的光辉；别林斯基、索尔仁尼琴脸颊瘦削，比黑格尔、谢林还适宜登台宣讲；托尔斯泰如果愿意，他足有30年时间走遍俄罗斯，创立一个新的教派。我洞悉列宾创作《伏尔加纤夫》、克拉姆斯科伊为“荒漠中的基督”抹上“第一道晨曦”时手指颤抖时的心情，我甚至感受到俄国天才、先知和圣徒们心脏收紧、血脉贲张、瞳孔放大时的速度与力量……不过我承认，越在意向上临近俄罗斯，这个横跨欧亚的斯芬克斯就越加遥远、陌生、神秘。

我太了解了，章诒和、陈文茜以及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无数中国人，共同经历了那个国家的苦难岁月的一代人，一旦踏上那片土地时的感受为何如此强烈。

我曾经三次应邀去凤凰卫视讲俄罗斯，讲它的历史、悲剧、艺术、宗教、地理。我比谁都清楚，包括我在内，所有中国人对俄国的了解，都多么浅、多么少、多么苍白。有明眼人在网上揭发，此人从未去过俄国，不懂俄语，他那点关于俄罗斯的知识全靠剽窃我国俄文翻译界的辛勤劳作所获。

此言不虚。何止王康，多少中国人迷上俄国，甚至把它当做自己的迦南之地，不都通过他人的译笔、眼光和尺度？“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0世纪上半叶，革命家们不约而同地弃德日、拒英美，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给中国引入全新的世界观、国家观、历史观，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以及抗日战争一百余年的历史轨迹一一改向，创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其名分、合法性，它所宗奉的天条、立于天地间的目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乃至宇宙、物质、宗教、精神、文化、艺术、精神、心灵无不烙下鲜红的俄国印痕。这个新中国的国徽、国号、国旗，国都的主要建筑以及流行数代人的旋律、色彩、爱恨模式，全都来自俄国。

据说现代精神的原则之一是多元选择和道德相对主义，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独特的见解，包括那些大权在握的人物。

十六七年前，从莫斯科到华沙到柏林，从布加勒斯特到索菲亚到布达佩斯、布拉格和地拉那，悬挂了半个多世纪的铁幕轰然坠地，中国一度惊愕不已。但后来才发现，苏联解体、东欧易帜未必是末日来临的序幕。俄国从此从国人眼里消失，昔日父兄恩主般的威仪尊荣以及降尊纡贵后魔鬼式的狰狞邪恶，都不复存在，俄国成为一片虚无。

无论这种东方式的势利眼为中国带来了多么丰厚的历史红利，无论中国由此摆脱历史包袱从而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的路多么令国人庆幸有加，无论时下国人以何种怜悯、嘲笑、轻蔑的情感看取俄国，我都把目光投向莫斯科，那里发生的一切更使我陶醉、神往，俄罗斯已成为我的精神麦加。

一个穿着破烂、在寒风中战栗的流浪汉，一个守不住家产却敢于重新上路的朝圣者，一个即使跌倒在地也举首望天的巨人，正是我的俄罗斯。俄国没有遵循他人的法则，无论金钱还是权力，独裁者还是小市民，都纠缠不了俄国人疲惫而坚定的步伐。俄国在自己家里破产了，但是比一切新老显贵更有尊严。俄国在全世界面前摔倒在地，狼狈不堪，但他站起来了，颤颤巍巍，一脸苍白衰弱不堪的俄国，高贵地微笑着，绅士般地抬起帽子，背好行囊，皮巧林式地瞥瞥那些兴高采烈的围观者，迈开步子……

俄国依然是世界的重心，就像三百年来一样，它再次把世界带到一个新天地，把自己放到约伯的天平上，世界再次目睹了一出真正的史诗正剧。

尼古拉二世全家的遗骸“连一根肋骨也不少”地从叶卡捷琳堡运抵彼得堡，安葬在历代沙皇陵寝中间。无论罗曼诺夫王朝欠了俄国人民多少宿债，俄国都有气量接受牺牲者亡灵的归来，俄国分辨善恶的底线宽广而深邃，忏悔和宽恕总

会像伏特加和黑面包一样,成为俄国灵筵最珍贵的佳肴。俄国人用一句“苦啊”,用额上和胸前的十字比划这样简单的仪式,就可以超越极恶与至善;俄罗斯面对自己罪孽表现的圣徒情怀,总是让自己噙满热泪,让世界肃然起敬。正如叶利钦在尼古拉二世遗骸前的悼词所言,安葬牺牲者“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俄国有勇气面对自己,“20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让俄国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俄国的悲剧。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罗马教廷为托马斯·莫尔、布鲁诺等欧洲良知恢复名誉,花了几个世纪;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图哈切夫斯基和几百万冤死者,在50年后就从地狱式的魔山噩海中被抬起,被“历史过滤器”洗去头颅的血污。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被宣判为暴君和刽子手,俄罗斯的历史—精神天平奇迹般地达到平衡。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流亡20多年后,归返俄罗斯。俄罗斯母亲有足够辽阔的土地欢迎所有游子的归来。这位“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表现了真正的俄罗斯儿子的忠诚:“俄国一再陷入可怕的状态,俄国必须摆脱帝国的狂妄和专制的深渊,俄国的弥赛亚精神才能复活,指引俄罗斯灵魂的星星还在闪耀,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由于俄国的牺牲精神,由于其政治家的良知高度,东西方冷战未经任何磨人的谈判戛然终结。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突然分享到多么巨大的恩惠啊。

困扰世界、分裂人类的冷战的两大阵营之间不共戴天的对峙,被一种虽然尚不系统、完整,然而已明晰可辨的人类意识和世界命运所取代。全球产业分工、资金流通的最大障碍陡然消失,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劳务输出如血液循环畅通无碍,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人类财富在十几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中国是受益最大的国家之一。

柏林墙一夜之间坍塌,就连浪漫的德国人也不敢奢望的统一由上帝之手完成了。东欧诸国回归一千多年中孕育的欧洲文明,欧元、欧盟、欧洲一体化进程,把欧罗巴推到恺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等依靠武力从未达到的欧洲联合与统一的大厦门口。欧洲沉寂了近一个世纪的智慧、活力、天才般的创造开始复活。

这一切都是在历史成本极低的基础上出现的,只有一个国家——俄罗斯——为此独自承担了主要责任。俄国的一切都是自己选择的,基督教、希腊精神、伏尔泰、启蒙哲学、黑格尔、马克思、十月革命……俄国再次作出选择,这次它选择了自由、民主、宪政和上帝。

从弗拉基米尔大公到戈尔巴乔夫,俄国人从不被世俗最高权力眩惑,从不满足于拥有全世界最辽阔最丰饶最美丽的土地。它有数以万计的教堂、修道院、要

塞和古堡，它以全世界最触目惊心的朝圣队伍走向弥赛亚降临时分。在俄国无数“弗拉基米尔大道”上，圣徒牵着天才的手，殉道者扶住战士的肩膀，整个俄国可以在一个男孩的眼泪前潸然哭泣，在一名妓女前忏悔，在大地解冻冰凌噼啪作响的早春像婴儿一样接受新生的洗礼。只有俄罗斯，并不以强大、富有、美丽自诩，而以神圣自命，弱者、罪人和天底下不幸的人，会优先蒙受俄罗斯上帝的垂爱。罗马式的贵族、美国式的资本家和中国式的暴发户都只会引起嫌恶和怜悯。只有在俄国，即使最彻底的战斗的无神论者，骨子里都是寻神派。俄国人要么信仰上帝，要么反叛上帝，但不能没有上帝。这个世界上，唯有俄罗斯，即使满怀绝望，即使所有天使下来接引，也不忍离弃自己的苦难土地。

俄国的一切都是真正独特、唯一、不可重复的。俄国的敌人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最强大、最可怕的征服者和暴君：蒙古一鞑靼铁蹄、拿破仑、希特勒。彼得一世在芬兰湾涅瓦河口一望无垠的沼泽河湾上建筑起世界上最宏伟壮丽的都城，几乎整个欧洲城市的精华都被移植到波罗的海梦幻般的夜空之下。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在几乎荒芜的俄国文苑里开出让世界眼花缭乱的奇葩，俄国19世纪的夜空一时群星辉耀。只有列宾、苏里科夫、克拉姆斯科伊，才敢于告别学院和前程，以俄国大地为背景，以俄国命运为题材，以俄国苦难和希望为模特，巡回漫游，睥睨东西画廊；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才能把一个伟大民族行将到来的灾难和使徒般的勇气写在俄罗斯音乐的殿堂；只有普列汉诺夫，只有《路标》的作者们，才敢在灾难尚未演变成浩劫之前，起身斥责未来的暴政，沉痛检讨俄国知识阶层对俄国人民不负责任的放纵和教唆；只有萨哈罗夫、罗斯特洛波维奇，才会在功成名就、誉满全球时坚守自由原则和良心高度，慨然与帝国分道扬镳，甘愿被流放；只有勃洛克、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才能如赴幽会地回归弥赛亚精神，把红色十字架涂在20世纪俄国的封面上；只有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全世界率先执掌亿万人生死大权的老布尔什维克，始终葆有某种人性和理想，拥有被放逐、暗杀和枪决的命运；只有在俄国，才会出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别尔明、克利维茨基一类藐视帝国的叛逆者，公开与暴君决裂的特立独行者……最让人惊讶的是，在俄国，在历史天平上，良心比权力更重，救赎战胜罪性，并不是贵族、知识人和社会精英的特权。无论蒙受多么漫长、深重的苦难，俄国人民从来不曾被完全奴化，被彻底败坏，甚至俄国统治者也始终残存着人性的底线，亚历山大二世在生死之际搀扶他人而倒卧血泊的形象多少摇曳着十字架的启示……只有在俄国，仅仅因为道德，人民一旦看清真相，就会任由一个令世界畏惧、令俄国“自豪”的超级大国毁于一旦而绝不为其再流一滴血。试问，当今世界上，哪个民族仅仅因为精神的纯洁和道德的高尚，就可以让一个不可一世的政权无助地垮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啊？它打破了西方三个世纪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在六分之一的世界陆地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一个新的国家，它代表了人类解

放的新希望,声称将把全世界的穷人和劳苦大众带到永远解放的道路上。它用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它的养老、住房、教育制度,它的芭蕾舞、电影、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黯然失色;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实现了第一次载人宇宙飞行;它的国防力量和核武库让西方心惊胆战,苏俄缔造者一百周年诞辰时,它的五大航母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弋。约翰·里德90年前写下《震撼世界的十天》后,患伤寒死在莫斯科,这名美国记者临终时为自己将葬在红场而无限欣慰。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同时为他的书作序,称“像约翰·里德这种描写了俄国革命捐躯者的葬仪的人,理应分得这份光荣”。一些名声更大的西方人,罗曼·罗兰、杜威、萧伯纳、居里夫妇、爱因斯坦、威尔斯等,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言辞,表达对俄国革命的关注和向往,尽管有更多数量的西方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俄国发生的一切正是对西方文明的直接威胁,俄罗斯将是西方文明的头号敌人,尽管俄国后来的历程比西方最阴暗的预言还要艰难。

没有谁能预告俄罗斯的未来,走出苦难和黑暗的民族不一定必然走向幸福和光明。但是,俄罗斯,连同它的悲剧和罪孽,都栩栩如生,如泣如诉。这个民族与太阳底下的所有民族一样,有自己的阴霾、不可告人的肮脏纪录和难以掩蔽的罪行。它那充满战争、征服、奴役的史迹,那举世侧目的秘密警察系统、书刊检查制度,可诅咒的苦役和流刑制度,充斥阴谋和杀戮的彼得—保罗要塞,以及它那极端、矛盾、绝对和末世主义的天性,它那亚细亚专制主义毒根与欧罗巴自由花朵之间的古怪嫁接,它那不时搅得邻人和全世界不安的神经痉挛性的历史发作,都使这个拥有双头鹰的雅努斯神,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再次让人们震惊。

我们应该庆幸的是,不是希特勒、东条英机,也不是本·拉登和其他动辄“不惜发动核大战”的独夫民贼和战争狂人,而是苏俄统治集团紧随美国之后,掌握了能毁灭世界的巨大核力量,即使在冷战最令世人绝望的时候,苏俄核电钮也从来没有被恐怖原则和邪恶指头掌控过。

克里姆林宫一度成为世界的希望,成为半个人类的祖国,不是没有缘由的。即使遭到重大的扭曲,付出前所未有的代价,俄国的救世精神仍然拥有特殊的启示意义。俄国的经验本来就由两个源头汇合冲撞而成。西方基督教、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以任何人也难于逆料的方式进入俄国,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一直是西方文明最自觉最宏大的中转地和实验场,俄国的蒙古—鞑靼军事专制主义与自由、平等、博爱何其难以相容,俄罗斯要逾越、战胜的,是世界上最难消解的悖论、最难抗拒的宿命。

但俄罗斯仍然是我的精神麦加。

俄国是奇迹丛生的地方,俄国让一切人类经验教训都黯然失色。当西方惊魂甫定,感谢上帝终于让俄国这个西方三百年来最大威胁成为历史陈迹时,俄国仍然维持着基本的尊严。它那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痛苦、迷茫,但仍然放射着光芒,那是几百年间俄国人在清水、碱水、血水中浸泡,在西伯利亚和古拉格群岛

上磨砺出来的光芒。没有玉石俱焚的怨毒、以牙还牙的仇恨，俄国表现出真正男子汉的高贵，自己的伤口自己舔，牙齿掉了和血吞下，肋骨断了用手撑住。没有谁，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给俄国一丝同情，让这个饱经磨难、自化脓血的巨人有所支撑仰息。世界在目击巨人倒下去的时候，是多么欣喜若狂啊！却没有留意到，这位巨人即使肢离体解，还是那么庞大、倔强，显示出超世的力量、不可摧毁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是，俄罗斯并不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一个民族面对如此的旷世劫变，表现得如此从容、庄严，甚至优雅浪漫……这正是神圣俄罗斯的本色！君不见，俄罗斯母亲，高加索的英雄，伏尔加纤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幽灵都在复活，自由、民主、多元和神圣的俄罗斯开始诞生。俄国正在领受新的天命，创造新的奇迹，它沉重的喘息使整个世界不得不倾听。在人类历史上，何曾出现过如此悲怆而壮丽的方死方生，敢恨敢爱！势利的人类至今不能洞察俄国的转向对世界的意义，是因为当代社会已经丧失了领悟和表达伟大史诗的能力，那曾是普希金、屠格涅夫、赫尔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等俄罗斯天才最擅长最倾心的活计。只要俄罗斯原野墓地上空的流云还在飘荡，无数教堂还在敲响悠远的钟声，白嘴鸦还在春天某个时分如约归巢，只要冬宫、夏宫、斯莫尔尼宫、克里姆林宫的雕塑、柱头、壁画、吊灯、陵寝和无数明亮清澈的眼光还在闪耀着光辉，俄罗斯就会升起照耀世界的星辰。俄国可能再度让世界不安，俄国更可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虽然没有去过，但俄国的一切都是那样熟悉、亲近，就像一位远行的兄长、老朋友，有时甚至就是另一个我。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知就表达过寻找精神祖国的世间原则：道之不行，乘桴浮于海。西方的自由、多元、富足固然令人向往，中国一夜暴富的诱惑和感官享乐的世俗狂欢未必毫无意义，但我只选择俄罗斯，无须安魂诗、“白痴”般的圣者、高加索的积雪、西伯利亚的原野，几首俄罗斯民歌、几句阿赫玛托娃的诗、几本《往事与回忆》，就足以教我心向往之了。俄罗斯，就在窗外歌乐山那边，同样的秋光下，不一样的月色中。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俄罗斯启示》的文章，里面有“圣地不空”几个字。近20年过去了，至今我还想得起写下这几个字时的感受。现在，它们大概已经融进俄罗斯灵魂复活的弥撒曲里。不敢自称为俄罗斯命运的东方祝福者，至少，在它空前困窘尴尬时，我没有报之以冷漠和鄙夷。因此，哪一天踏上俄罗斯土地时，我会怀着对一名不曾谋面却心仪已久的老友의倾慕说：你好，我的麦加！我的俄罗斯！

（作者：自由撰稿人，现居重庆）

对社会保持理性的距离

——尤西林教授访谈录

■ 尤西林 贺 靛

●(贺靛)审美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境界,美天然地亲近善。因此我们会把美看做与道德挨得很近的领域。尤西林就活在这个和道德无限接近的地方。一般来说,审美经验越丰富的人,其道德观念就越清晰,因为他有健全的品位。美学研究使得尤西林和人文精神天然相连了。

与尤西林的交谈耗时颇长。他严谨,从来不用“可能”、“大概”等词语,每一句话都干净、明晰,一板一眼,有如他穿的那件灰色挺括的衬衣。他有现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理性。

尤西林说他的生活非常枯燥,他大体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学者。毕竟丰富的阅读和研究是需要他支付代价的。大学校园天然地保护着他与这个大众潮流的世俗文化保持距离,所以会使他获得同时代一般人不易获得的立场和眼光。

他说不会去否定现代社会,但会不断地对它进行批评和反省,期望它有所完善和发展。“如果我具有人文知识分子的这种气质的话,需要对现代性现象本能地介入和批评。”所以他积极地介入这个社会,同时也保持着一个批评性距离。

中国的伦理危机

●你研究的是美学,又研究宗教、文艺学,你是怎样担当这些不同身份的?

○(尤西林)这些专业看起来好像是从属不同学科,但有相关学术经验的人可以看出其中的相通之处。我实际上是关心这些学科的内在此相通之处,就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在传统上主要隶属宗教信仰,但在我国缺少宗教文化信仰的背景中,精神文化主要是和审美以及道德伦理相关联的。蔡元培曾有一个说

法,就是以美育代宗教。对中国人来说,这实际上意味着审美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一种神圣的维度。这种关系使我能内在地进入宗教学研究,同时从事美学研究。

我也关心当代人的文学艺术活动,因为文学艺术是审美创造的集中表现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活动包含现代艺术和文学,因此我也注意文化研究。这些东西在我这里其实是内在地相通。我会注意它们在社会学意义上的形态,比如当代中国人信仰状况的调查。我做这些,实际上是为了探究当代中国人精神信仰的境况。

对上述理论和现实的研究,我都有一个基点,就是我们所身处的现代化转型的中国。今天,中国已经取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这个转型中也出现了某种断裂或者说真空地带,这表现为人们对终极性精神信仰以及关怀削弱了,人们将金钱和物质财富的享受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目标。在这种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幸福主义和快乐主义的人生观。无论西方还是中国,这种人生观在人类文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古罗马文明,曾是西方文明最高的代表,但在后期丧失了创造的活力,享乐主义盛行,最终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中国殷商时期的殷纣王,有所谓的酒池肉林,他享乐的花样其实并不逊于现代人。因此,当代中国人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如果不能相应地解决自己精神信仰的问题,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使物质文明失去深远的动力以及价值意义,并导致社会阶层、集团之间以及个人之间对财富的争夺与占有。这种争夺在今天已经显现出恶性后果。

这是社会转型的代价。我刚才所讲的精神文化的代价,它会体现在社会层面。比如说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对社会伦理的破坏,这两个东西表面上都是渐进性的,但实际上,就其已造成的破坏程度而言,中国需要几代人才能够恢复,因而影响是深远的。

今天的中国,物质文明昌盛,但支撑它的内在精神文化不仅相对滞后,甚至可以说是倒退和落后的。很多人可能不接受,认为我讲得过于严重,但我宁可把这个问题过分地强调一下。我所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基于这样一个国情,而这一国情构成了我研究宗教或审美文化、文学艺术的基础和背景。我是随着这一现实关怀进入上述领域,甚至还可能进入社会科学或政治科学领域。

●你刚才提到了当代人要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人是没有自己的显性精神信仰的,没有共同的精神支柱。会不会因为国人缺少这样一种信仰,致使道德滑坡?

○早在殷、周时期,特别是周以后,中国人就将一个伦理性的社会关系取代了人与神的关系。孔子把“仁”作为他的学说基点,其基础就是中国农业宗法社会。这种社会势必要求伦理作为它从下到上的结构,因此,就信仰的缺失而言,中国当时并没有失去社会整合的能力。社会把社会人性的统合交给了伦理,伦

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很特殊的重要地位。这和西方不一样,在西方,伦理是低于宗教的。由于中国没有一个显性的宗教,伦理就成为一个宗教性规范。无论古代的贞节观、忠孝观、个人修养,还是20世纪以后的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对革命理念的体认,都被看成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这个社会是需要现代化中发生转变的。它必须注重人和自然在物质生产中的关系,这就是大家熟悉的20世纪后半叶的改革。这个改革一方面是人们物质生产的活动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其相应的社会制度有所改进;另一方面由于失去了伦理的约束,因而没有西方类型意义上的宗教作为后盾或底线基础。所以,今天中国的伦理状况以及伦理之外的普遍精神、道德状况,都有深广的危险。无论政治上的腐败、商业中的投机,还是民众中的实用和功利心态,都可以表明这一点。它的恶性发展便是一些无恶不作的行为在当今社会的频频曝光。重要的不是具体的人事,而是趋于全民性的非道德心态。因此我不把刑事犯罪仅仅看作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更是伦理危机乃至社会危机的一个征兆。今天甚至出现了血亲之间的残杀,作为民众行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这表明了当代中国伦理危机的危险程度。

●伦理严重滑坡的根源何在?是因为经济的发展,还是因为西方伦理对其有一定的冲击?

○刚才你也提到,伦理状况受制于宗教,西方是这样,古老的中国也是这样。比如周公制礼作乐,本身是从敬天这一古代宗教转化过来的,通过礼和乐来承担宗教对天即至上神的崇拜,但是中国的至上神后来转变为祖先神,直接导致了伦理本位。

这一演化是否可以解释为中国伦理危机的渊源?我不敢说。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几千年的伦理是非常强大的,无须宗教做后盾。当然它有一些负面的问题也很严重,清代戴震说过“以理杀人”,就是说伦理可以迫害人。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此发起了激进的批判,也可说是延续了这个方向的思考。今天中国伦理的衰败怎么解释?我想显然不能直接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果。因为经济发展要求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更加理性,具有公民道德,应该是对道德有促进作用的。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是认同私人财产本位的,这对个人的人生观有塑造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私有财产的积累和追求会强化人的享乐和占有的观念,但又不尽然。

并不是说西方有多好,但我关注一切可以成为中国积极资源的东西。西方可以在宗教的背景之下占有财富,把积累财富纳入个人救赎的条件。这就是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激励。同时他们认同财产的非私人化的转变,这不仅是指捐赠和慈善活动,也包括他们将财产更多地交给社会体制性的经理阶层作理性管理。这和我们在中国看到暴发户将其所得作为个人挥霍是迥然不同的,这里显然有宗教信仰有无的不同。

我这样说,并不是暗示解决当前中国伦理问题就一定要回到西方宗教。理由有二:

第一,不可能。宗教不是人们因急功近利而临时预设的产物,它是在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所谓“轴心期”)逐渐积累起来的,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当时的生产和文化形态的一种天然的结果。这个结果留给现代人,一开始和现代化也不是没有矛盾。它是逐渐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基督教是典型),才变成现代普世价值的一个积极资源。今天怎样把几千年积累的文化通过我们的理性设计出来呢?这不可能。

第二,宗教对伦理有积极意义,这对中国来说确实是传统资源匮乏,但不是说国人不能在其他文化的传统中找到伦理建设的资源。比如说共产主义理念,它曾经在1949后成为国人伦理的一个重要基础,那时的社会风气至少是清廉的。

这就提醒我们,可以在宗教之外寻找新的伦理资源。我会注意古代文化中的伦理资源。比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在今天怎样转化为积极的文化价值。

我也会注意晚近百年历史时期的道德资源,比如共产主义理念之源起,本身就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批判性校正;共产主义讲男女平等的同志关系,至今仍是一个很新的现代伦理形态。

还有民间的底层文化,也有它的伦理基础。我们可以考察它是怎样生存和发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进行民间信仰与社会宗教文化研究的缘由。我不放过任何当今能供我们重建中国精神信仰的资源,只要它有资源意义,我都会去关心。

社会需要知识分子的关怀

●你曾说过,中国不存在真正独立的人文精神。你对中国的人文精神真的这么悲观吗?

○我讲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独立于权力、独立于世俗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只有具备了超越性的价值、操守和理念的社会阶层才会拥有。我把这一阶层的人叫做人文知识分子,把他们所坚持的精神叫做人文精神。

我作过这方面的研究。人文精神在现代西方社会是从宗教转化而来的,比如大学就是从修道院转变过来的。因为有这样一个精神传统,通过一代代的历史磨炼、积累,所以它有基础。中国古代社会也不是没有代际传承的精神信仰,比如,儒家文化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向上的一面。我可以把向上的这一面称做中国人文精神的古代形态。

但是在当下,这些资源,无论古代儒家还是共产主义理念,都遭到了重大挫

折。年轻人如果读过陈忠实写的小说《白鹿原》，就会看到中国传统儒家精神、道德以及支撑它的结构，比如乡绅制度是如何被 19 世纪到 20 世纪的社会变革摧毁的。摧毁以后，人们引入新的信仰，但新的信仰在 20 世纪后半期又遭受重挫。我们今天对此所作的反省和分析远远不够。

当我说独立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不存在，我实际上是在强调一种反省和批判的态度，因为中国传统中缺乏绝对的信仰性的维度。我们的道义价值或者人生的终极信仰价值都是和不够纯粹的传统与观念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会造成它的软弱或相对主义。这便引诱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及其“人文精神”往往转变成权力的幕僚或者财富的附庸。事实上，无论是世俗政治权力还是财富的拥有者，他们本身都不拥有一个对于他们自身存在的终极价值的独立解释权。这个独立解释实际上是超越其存在的，他们需要这样独立的解释提升自己。在西方，权力与财富对信仰精神仍然保持着敬意。因为这一点我才强调，中国不存在独立的人文精神。当然，在相对意义上，或者作为吸收和挖掘资源的意义上，中国也是有人文精神的。

●你刚才说到知识分子的问题，似乎更强调其社会责任感，可否详细阐释一下？

○“知识分子”的概念长期以来是社会学的一个分类，静态地标志一个人接受学历教育的程度。但“现代知识分子”的概念则带有人文哲学的定位。它指现代社会中的这么一个阶层，他们关怀公共权力运作与社会精神进程，并以此为道义担当，所谓“铁肩担道义”。这批人我们叫做知识分子。比如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出现了德雷福斯案件，这桩冤案引起以左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人的抗议。这批抗议者被叫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作为人类正义、社会良知的人格群落载体，他们确实比坊间更关心社会的法制、民主、自由以及根本的价值和道德准则。这种对正义的道德准则的关心，实际上是现代社会政府所需要的。

民主宪政的要害，就在于从制度上去防止政府对公权的滥用。然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支撑制度的精神及其骨干成员，需要有一些人能超越权力，进行批判和监督，知识分子在这里代表的是不同于有形国家的社会。社会概念是和知识分子密切相关的，古代中国称之为“天下”，它有神圣性。知识分子的依托体不是政府而是社会。社会是大社会，政府是小政府，小政府是大社会中的一个环节，它需要社会良心的代言人来进行监督和守护。因此对知识分子的现代理解更应该侧重于这个方面。

当然这样一种公共角色是和人的受教育程度相关联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多就是知识分子。有一些人把知识作为技术工具，而丧失了我所说的社会关怀。这种意义上的专家学者，我们不把他叫做知识分子。韦伯所说的专家无灵魂，指的就是这类人。